



REVIEW

Memorializing an Excellent Anthropology Professor Tichen Dong

Qingwu Lu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CAS, Beijing 100044, China
Editor's Summary: Professor Tichen Dong is one of the leading teachers i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at Fudan University during the 1960s. He has got his master degree in Soviet Union. After he came back to China, he taught anthropometrics for Fudan University and supervised many students. Unfortunately, he died of the persecution in Culture Revolution. We should never forget the contribution of Professor Dong to the field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现代人类学通讯 2014年 第八卷 第37-39页 专题综述

怀念人类学良师之楷模董悌忱

陆庆五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100044

编辑提要: 董悌忱先生是复旦人类学组早期的重要教师, 早年留学苏联, 回国后为我国人类学领域培养了大批人才。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复旦人类学的师生至今怀念他。



图1 董悌忱先生遗像

董悌忱先生出身于北京书香门第,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 公派苏联留学, 攻

读莫斯科大学人类学系。1962年他学成回国, 径直来到复旦大学生物系人类学教研组执

教。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讲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盛操沪语的校园里，他显得十分“抢眼”，加上他快言快语，嗓音亮爽，面带笑容，令人感到无比的真诚与热情。当时，我就读于复旦，有幸聆听到董老师首次开设的两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即《人体测量学（活体）》（简称：活体测量学）和《古人类与古灵长类学》，真是无比幸运。这两门课程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在校时我的毕业论文选题作“活体测量学”方面的研究，由董老师指导。我与他接触到机会比其他同学多很多，不仅学到丰富的人类学知识，还感受到他那丰美的人格魅力，他成为我完成复旦学业最重要的导师。我毕业分配到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之后，主要从事古灵长类学方面的研究。董老师传授给我的古人类与古灵长类学知识成为我研究工作的“原始资本”，为我的科研启程壮了胆，他赐予我的这笔“精神财富”享用至今！

教师的教学质量主要体现于他的“讲课”之中。董老师讲课是“词语清晰、达意明确”，这与他清晰的北京话不无关系，并且他讲课时善于板书“立意明显、结构夸张”的示意图。例如，他讲到我国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三大区域居民的脸型特征时，分别借用“国”字形，“瓜子”形和“田”字形作比喻，并在黑板上辅以夸张的几何图形，令学生记忆深刻；又如，讲到人类牙齿尖的形状及分布位置时，他作出了“简练而形象的齿冠模式图”，将人类牙齿的特征描绘的淋漓尽致。董老师的讲课易使学生获得清晰的概念，至今再翻阅他的课堂笔记，这些基本概念又重新深印于我们的脑海。

我们所学的《人体测量学》包括对“骨骼”和“活体”两种测量对象，前者由吴定良先生执教，后者由董悌忱先生执教。董老师开设的《活体测量学》从对毛发、胡须、肤色和眼、鼻、耳等的颜色或形态的“观察”，讲到“测量”颜面、躯体和肢体等的规范与分型。听了他的课程，当时我联想到高考前我从《招生指南》上得知：应用人类学可广泛应用于对生活用品、家具和对有关人体的建筑设施、交通工具和武器装备等的设计。原来应用人类学有如此奇妙的“创造空间”。由此，我欣

然报考了复旦人类学专业。当我学完《活体测量学》后来才知道施展这种“创造空间”之手段就是“搞活体测量学”。回忆起1958年我们入学不久，正值高校进行教育革命，倡导“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为此，我们跟随教研组老师和学长共赴上钢五厂，对工人进行大例数的活体测量，测取适合中国工人体型的劳保工作服尺寸标准，以摆脱中国工人长期穿着英美制炼钢服的不适之苦。上述经历使我理性地认识到，活体测量学是在设计“广义的生活用品”时要增添其“科学性与舒适度”。这门学科在设计人们的生活用品时能起到如此深层次的作用，挺有意思！由此，我思想上激起了“将来搞应用人类学”的思绪。当系办公室向我们征集毕业论文题目是，我向董老师提出“搞活体测量”的想法。董老师根据当时的条件与可能，建议我搞华北、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三大区域人群的“头面部形态学测量”。我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就地取材”，测试本系男生的头面部数据。我设计了“观察与测量”表格，经董老师审核，我自刻蜡纸，送校出版科印刷了300份表格。

我的毕业论文就从“测量”开始，董老师背上相机与我一起走访了生物系男生宿舍，寻找测量对象。测量之初，董老师仔细地注视着我的测量方法与读数，不时加以纠正。此期间，董老师还细心地物色着被测量者的脸型，见地域性特征较典型者就摄取正、侧面照片各一张，拟作我论文的插图。这些测量与拍摄工作都在课余时间内进行。测试的时间短，环境乱，一个单元时段内测不了几例，经常是临近晚饭时分收工，这时董老师才乐呵呵地回家。我与董老师就这样度过了测试初期的十余天。我撰写毕业论文的全过程处处得到董老师的亲切关怀。当我对测量数据做统计分析时，在系图书馆的中英文图书及杂志中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参考文献，董老师马上将有关的俄文资料提供给我。由于我不懂俄文，他便将有用的论述和数据译成中文给我。当我把写就的毕业论文请他审阅时，他见我论文的结论与前人的有关论文相呼应时，高兴地对我说：“瞧，你不是写出一篇很好的论文嘛！写学术论文不神秘吧，

是不是？只要踏实地作科学的分析与推导，总可得出客观真实的结论”。他的这番话对我的“初次习作”做了肯定，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打消了我潜意识中对写学术论文的恐惧感，为我顺利完成毕业论文打了一针“强心剂”。

我们1963届人类学专业毕业生中六个同学分配到北京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当时举国上下办事都以“突出政治和阶级斗争”为纲，中科院要求新分配到所的大学生必须先参加一年的基层体力劳动。最初我们参加了几个月的基建劳动，此后我于1964和1965年分别参加了陕西省蓝田猿人产地之陈家窝和公王岭地点的野外发掘，累计一年的劳动锻炼终算完成。不久，我国的政治领域又展开了规模宏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所谓的“四清运动”。中科院职工作为国家干部必须参加“四清运动”，我们到河南省禹县，投入农村的“四清运动”。紧接“四清”的便是1966年春全国范围内发动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因此我们毕业分配后的三、五年间充斥着不断的政治运动，几乎没进行过长期正规的科研工作，只是短期参与了一些配合“上级”的科研活动。譬如，我们到所不久，我人类室中搞体质人类学的年轻研究人员都投入了协助吴汝康院士编纂《人体骨骼测量手册》的辅助工作，我与62届学长周国兴被分配作“肢骨”的测量。我们对所藏的成套的现代人上、下肢骨做了系统的测量，经历了肢骨研究的全面训练。这批测量数据提供给吴先生，为其编写“肢骨测量”章节做参考。1975年上半年我接到所业务处下达的任务，鉴定江西省宁都县公安局送交无名尸骨，经我鉴定死者为身高1.6米的男性青少年。宁都县公安局的同志对我的鉴定结果较为满意，他们终于破获了一宗民间纠纷所致的谋杀案。上述的“肢骨测量”和“破案”实践表明我在复旦所学的《人体测量学》只是为我此后胜任骨骼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此外，中科院层下达我人类室编写《中国百科全书》中有关古人类学和古灵长类学条目的任务，我被分配撰写若干篇有关中新世猿类的条目。为此我参考了董老师传授的“古灵长类学”的课堂笔记之有关章节，补充了有关新材料，顺利

完成了这次编写任务，由此产生了我今后想搞古灵长类学的兴趣。文革后期，进入“抓革命促生产”阶段，中科院号召各所制定新的科研规划，我与徐庆华先生（42届复旦校友）提出了“调查与研究我国西南地区的古猿化石”的课题。1975年秋我们到云南省禄丰县石灰坝村，在中新世褐煤堆积层寻找古猿等哺乳动物化石，开始探讨与人类起源有关的“中新世古猿之演化”的研究课题。董老师传授给我的“古灵长类学”知识非常给力于我们的研究工作。1980年后我课题组充实了多名地质学和哺乳动物些方面的成员，由吴汝康先生领导这课题组。1986年我们课题组荣获中科院的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最后，我与徐庆华在退休后受邀参加国家“九五”攀登专项“早期人类起源及环境背景的研究”项目，于2008年出版了系列专著之三《禄丰古猿——人科早期成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我所以能顺利地有关人体骨骼的测量与鉴定和古灵长类学的研究工作，没有在复旦大学五年的学习经历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修业于董老师的《古人类与古灵长类学》，那是寸步难行的。

我与董老师虽然在复旦只相处了两年，他传授给我的人类学知识和他的高尚情操让我受益匪浅。特别使我感动的是董老师在知道我撰写毕业论文时散发出的“热忱扶植学生搞学问”的精神象一股热流涌入我心头，温暖着我学术的生活，至今仍难以忘怀！这种“热情”，我相信一定来自于他那颗“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我相信他赴苏留学时一定牢记着年轻共和国托付于他的历史使命——学成回国后担负起“培养新中国自己的人类学家”之神圣职责。他跨入复旦校门后，与教研组教员连续培养了三、四届人类学学子。他的所作所为没有辜负国家所望！最后，他却在荒唐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尽诬陷而丧身！中国痛失了一位可敬而得力的“中国人类学导师”！赵一清先生曾深切地怀念之：董悌忱先生离我们而去，导致我教研组“家破人亡”，是党和国家科学事业上无可补偿的损失，言之痛心，思之凄哽！

2014年2月25日